

当周恩来收到“新年礼物”后

1960年,江西省给国务院送来一些橘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把橘子原封退回去,一个也不能收,并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这年春节前,正值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周恩来得知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并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也在春节前后,天津市

某县领导同志带着3万斤鱼到北京,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接待了他们。他们说明来意: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吃不上鱼,他们那里产鱼,带来了3万斤,送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

国务院办公厅的直接承办同志立即将这个事报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习仲勋随即又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决定,明确指示了两条:“第一条,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应当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能搞特殊;第二条,请北京市商业局收购这3万斤鱼,然后投放市场,卖给群众。”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

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回信中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周恩来还亲笔在这份通知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随信附寄的这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

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5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

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孟虹

延安的“精神状态”震动国民党考察团

1937年5月,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访问,这是国民党方面派到延安访问的第一个官方考察团。他们眼中的延安是怎样的情形呢?

5月29日晚,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考察团将此次访问锁定在三个主要地点:抗日军政大学、贺龙部队、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

在抗大,涂思宗一行见到了在这里学习的女生康克清,只见她“打绑腿,面貌黑,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年龄不过二十”。当得知她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时,涂思宗一行请康克清讲讲恋爱经过。她笑答:“我们是因革命而发生感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

当到达贺龙司令部时,涂思宗发现贺龙正在吃早饭,“桌上摆了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和士兵伙食相同”。贺龙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长征的故事,他说:“诸公,不要以为我们这种生活苦,这比长征时要好得多。我们经过川陇交界的松潘草地时,曾六七天未举过火,真是苦极了。可是绝处逢生,有一天正在断粮时,发现草地中有一小湖,湖里生着密密的肥鱼,那天就以鱼为粮吃个大饱,还抓了许多带走。”

6月5日,涂思宗率领考察团军事组到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访问。在他们眼中,彭德怀短小精干,有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与士兵无异。前指虽设于山沟中,军中书籍却不少,包括苏俄、德国和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军事书籍。

考察结束后,涂思宗一行都觉得共产党部队的训练方式有若干地方颇值得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过低”。

这次考察团的延安之行,是自1927年国共分裂十年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的真正实力,为蒋介石决策提供参考。涂思宗的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
何立波

日军为何不敢与美军拼刺刀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经常发生肉搏战,也成就了中国大刀威名的威名。但让人不解的是,日军在与美军的作战中也发生过白刃战,但都只是昙花一现。

刚开始,美军被日军的气势吓着了,伤亡较重,美军

也非常头痛日军的这种玩命战法。后来,美军研究发现,手枪是近距离作战的理想武器。实战也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大。它长度

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

力远超过刺刀。为了近距离打完之后再有时间装子弹,美国人将三人编为一组,如果其中一人子弹打空,其他两人可以掩护装子弹。美军短枪对刺刀的战法一出,日本人再也不敢随便找美军拼刺刀了。
张显强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公益广告



适量取餐

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文史杂谈

古代“总裁”都管啥

古代的“总裁”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总裁”指的是中央修订史书的主管官员。史书的编撰在历朝历代都是皇帝最为重视的。在清代,修订史书的机构主要有国史馆和实录馆。这两个机构负责修订、记录、编撰的官员都被称为“总裁官”。

国史馆最初是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设立的临时机构,主要任务就是修订清代前三代皇帝在位时的历史。到了乾隆初年,因为修订史书的需要,国史馆从原来的武英殿附近搬到了东华门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国史馆终于成为一个常设机构。

实录馆则主要是新继位的皇帝为了记录已去世的老皇帝的日常重要片段而临时设立的,它的“总裁官”地位可是相当高呢,因为能力卓越的“总裁官”有很大机会被载入史册,这种被载入史册的荣耀是十分难得的。

第二类“总裁”指的是中央负责编撰书籍的主管官员。比如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开始编撰的《四库全书》,其总负责人就被称为“总裁”。在专门设立的四库全书馆中,《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共进行了16年,据学者统计,其间共有16位正总裁和15位副总裁先后负责编撰工作。

你知道吗?清代名臣张廷玉就曾当过《明史》《大清会典》等书编撰工作的总裁官呢!

第三类“总裁”是会试的主考官。会试是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在京师举行,每三年举办一次,只有各省的举人和国子监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起初会试只由一位正总裁和一位副总裁负责,后来增加为由一位正总裁与三位副总裁负责。

上面介绍的三类“总裁”都是文官,都跟文化关系密切。
朋哥